

研究論文

「中國」的一年：新聞、閱讀與民族—國家 在日常的興起(1894-1895)

卞冬磊

摘要

有關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或民族主義的研究已汗牛充棟。以往研究偏向以從上至下的視角，討論民族國家的建構或民族主義的象徵等主題。與之不同，本文將民族國家看作是普通人日常實踐的產物，以晚清部分讀書人日記為史料，聚焦1894年6月到1895年4月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特殊的一年，嘗試探索分散各地的讀書人如何經由日常的實踐，生成和確認國家的日常形式。研究發現，在「中國的一年」裡，讀書人主要通過閱讀上海新聞紙追隨戰爭進程，形成了全國性的關注；進而，在普遍的閱讀實踐上又生成新的交談方式，「議論時事」成為重要的日常活動；更進一步，讀書人還以「悲痛」、「憤怒」和「羞恥」三種集體情感「情動」於國家。本文認為「中國的一年」中的閱讀、交談和情感實踐，使得近代讀書人第一次擁有了政治意義上的「同一個中國」。

關鍵詞：民族國家、讀報、交談、情動

卞冬磊，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與新媒體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2018-2019)。研究興趣：中國新聞史、報刊與民族國家、新媒介與人際關係。電郵：toto1982@126.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8年11月9日。論文接受日期：2019年4月2日。

Research Article

One Year in China: News, Reading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 in Daily Life (1894–1895)

Donglei BIAN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ny recent articles about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and nationalism, focusing on topics such as national construction or the symbolism of nationalism from a top-down perspective. In contrast, this article regards the nation as a product of daily practice. By reading diaries writte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research concentrates particularly on the year from June 1894 to April 1895 to explore how ordinary people generated and confirmed the concept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 in everyday life. It finds that intellectuals followed the war process and formed concern about the nation's future by reading Shanghai newspapers. In addition, they developed a new way of talking about the grief, anger, and shame that characterized three types of collective feelings about the nation.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ntellectuals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a collective China in political sense.

Keywords: nation, reading newspapers, talking, affect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Bian, D. (2020). One year in China: News, reading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 in daily life (1894–1895).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2, 87–115.

Donglei BI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ews & New Media,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newspapers and nation, new media and human relationship.

One Year in China: News, Reading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 in Daily Life (1894–1895)

致謝

本文為 2015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近代報刊閱讀史及其史料庫建設 (1815–1919)」(項目編號：15CXW003) 的研究成果。作者從兩位匿名評審人及《傳播與社會學刊》編輯之處受益良多，特此感謝。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引言：作為日常實踐的國家

1895年的三、四月，是近代中國的「多事之春」。四月初六，新晉翰林院進士蔡元培，在京師得知朝廷與日本簽訂「和約十事」，「痛哭流涕長太息」(王世儒，2010：31)。同一天，居於浙江溫州鄉下的舉人張桐，讀到了三月中旬的《申報》，知悉議和「確音」，深感「國恥」，「閱竟為之一嘆」(俞雄，2003：24)。而在江西和湖南之間來回奔波的舉人皮錫瑞，從三月廿六起就持續關注著這件事，並不斷與友人談「時事」，憤怒傷心之餘，有「亡國之兆」的感嘆(吳仰湘，2015：400)。

陳旭麓(1992：154)說：「1840年以來，中國因外患而遭受到的每一次失敗都產生過體現警悟的先覺者。但他們的周圍和身後沒有有意義的群體，他們走得越遠就越是孤獨。」事易時移，上述三位讀書人，所在省份不同，人生際遇差別亦大，雖然談不上是什麼先覺者，卻也不再形單影隻。事實上，翻看當時許多讀書人的日記，類似這樣的閱讀、交談和心情，殊為平常。對此，我們不禁要問，在1895年的春天，分散各地的讀書人為什麼可以同時關注戰爭與議和？實現這種同時性的社會條件是什麼？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化？進而，對國事和國恥的持續關切對近代中國人的國家認同(nationhood)有何意義？

學術界關於歷史中國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國家(nation)的研究彼此糾纏，形成兩種不同的認識論。一些研究者認為，中國很早就產生了民族主義思潮。譬如，呂思勉(1948：35-36)即曾說：「民族主義，原因是受異族的壓迫而起。中國自宋代後，受到異族的壓迫漸次深了，所以民族主義，亦漸次勃興。」這種認識論傾向於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發現「原初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近年來，因Duara(1993)將中國界定為「自我意識的政治共同體」(self-conscious political community)和葛兆光(2011)「從周邊看中國」而尤引人矚目。這自然挑戰了另一種更常見的認識論，即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的產物，「前現代中國所認同的是文化和歷史傳統，對什麼是nation毫無概念，因此這種文化主義與基於現代民族國家概念上的民族主義毫不相干」(方維規，2002)。許多研究者自覺採用這一範式書寫近代中國的歷史。近年來，隨著對「天下」、「國家」和「世界」等概念的分析(金觀濤、劉青峰，

2006)，進一步強化了1895年作為開端和轉折的意義。總之，「深重的災難同時又是一種精神上的強擊，它促成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民族認識的亟變」（陳旭麓，1992：154）。

有一些解釋可以稍稍緩解兩者的矛盾。伯林(Isaiah Berlin) (2009：246–247) 指出：「民族認同的意識也許就和社會意識本身一樣古老」，但在「遠古時期或古典時期，似乎就沒有出現過什麼民族主義」。具體到中國情境，則又如羅志田(2011：12) 所說：「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早已凝固而無需強化，但對一般中國人來說，這個民族的認同感恐怕更像是像章太炎所說的那樣潛藏在心中，遠未達到『活躍而自覺』的程度，如果不出現大的內憂外患，大約也就會基本維持在潛存的層面」。換言之，在歷史中國的各個時期，民族意識普遍存在，但其被激發出來的條件不同。因此，宋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和清代中國有著極大的差異，特別是19世紀末，清代所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

本文認為，「民族主義」譜系的概念複雜多面，難以捕捉一個穩定不變的意義介入到普遍的歷史。若要加深對這個議題的理解，更好的辦法或是另闢蹊徑：我們能否懸置對共同體性質的追問，並從宏大敘事、既定概念和自上而下的研究慣例中走出，進入特定歷史時期一般中國人的生活之中，去探究民族—國家在日常的實存狀態？

只要對民族主義的研究進路稍有了解，就可知曉此種路徑的來源。1995年，Billig (1995) 跳出宏大敘事，開始關注日常生活中各種平淡無奇的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 形式，譬如天氣預報的用語、報紙的標題、體育比賽的解說等。在此潮流的引領下，「出現了一種在族群和民族問題研究上脫離僅關注精英方案的『宏大敘事』，轉而系統地研究大眾信仰、情緒和實踐所起作用的趨勢」，研究的重心變成「普通的人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並在他們的日常活動及交流過程中創建出民族和民族認同」（史密斯，2011：84）。近年來，學者們又進一步，改進了 *Banal Nationalism* 研究範式的文本取向，發展出一種以人的行動為主體的「日常的民族主義」(everyday nationalism)，更加強調實踐對民族國家的生產意義(Knott, 2015; Fox & Ginderachter, 2018)。對此轉向，Fox & Miller-Idriss (2008) 曾提供了頗有啟發的方法論，而認為國家存在於以下實踐之中：「談論國家」(talking the nation)，在日常談話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中完成對國家的話語建構；「選擇國家」(choosing the nation)，對國家的認同潛藏於人們所做的選擇；「表現國家」(performing the nation)，用儀式化的符號形塑對國家的感覺；「消費國家」(consuming the nation)，以日常消費習慣建構和表達國家間的差異。

回到中國歷史場景，本文嘗試循著上述路徑，以晚清幾位普通讀書人的日記為史料，以1894年六月到1895年四月這個十分特殊的「中國的一年」為時限，探索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如何經由讀書人的日常閱讀、交談和情動(affect)而被創造。本文的題目「『中國』的一年」，直接受沈松僑(2009)〈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和國族想像〉一文的啟發，但與他分析眾多普通中國人書寫的文本不同，本文的提問圍繞着實踐展開，即：在甲午戰爭與乙未議和期間，晚清讀書人如何獲取新聞？如何談論時事？對國家產生了哪些情感？在上述問題一一解決後，本文還想探討新聞紙這種新媒體之於「中國」的意義，以及它是否持續影響了讀書人對國家的感知或僅是曇花一現而只有「一年的中國」之意義？

獲取新聞：電報、新聞紙與口頭網絡

如所周知，1895年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之開端(張灝，2006：134)。這個特別的歷史時刻究竟發生了什麼，能夠促使中國人的集體意識發生轉變？除了種種學理探索之外，梁啟超(1954：133)作為經歷者的追溯也值得關注：

吾國之人視國事若於己無與焉。雖經國恥、歷國難，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然也。且其地太遼闊，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絕，異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視若異國焉，各不相知，各不相關……故非受巨創負深痛，固不足以震動之……直到台灣既割，二百兆之賠償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

這段話除了說明1895年的割地賠款，造成了巨大創傷而導致中國人的集體覺醒之外，還透露了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即人們在社會事件中的聯繫。按照梁啟超的觀點，由於國家地理空間過於廣闊，交通

不便，所以分散的人們，基本處於彼此隔絕的狀態。因此，在19世紀的中國，即使有幾次類似鴉片戰爭這樣規模的失敗、國難和恥辱，也沒有辦法形成一種全國性的回應。由此，我們不禁要追問，為什麼到了1895年「異省之民」的隔絕狀況就消失了？這促使我們思考晚清的社會傳播問題。換言之，如果沒有一種有效的社會傳播將人們聯繫起來，分散的讀書人就無法共同獲得和回應確切的消息，即使議和造成的個體創傷再大，恐怕也難以累積和擴散。

一種全國性創傷的擴散需要一種全國性媒介的廣泛參與。事實上，在甲午乙未年間，戰爭與議和事件所依靠的傳播網絡，較之半個世紀前，已經有大幅度地變化。當時，許多讀書人的日記中都留下了獲取時事的記錄，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個問題的線索。此處，我將以五位不同身份讀書人的記錄，來說明當時社會傳播的狀況及其影響。

第一位是處於權力中心、時任軍機大臣的翁同龢。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戰爭進程，是消息最靈通的人士之一。從消息源看，翁同龢主要通過電報和奏摺獲得朝鮮戰事。1884年以後，清代的電報線已延伸到北京，並優先用於傳遞官方消息，「朝廷、地方官員、海外使臣之間借助電報的通訊急速增多，所有往來的官方電報都由總理衙門的一個辦事處接收、翻譯和處理，因此成為首都政治信息的樞紐」（周永明，2013：66）。借助電報及奏摺，翁同龢獲得各類消息的時間最早、數量最多、細節也更清晰。早在1894年五月廿二就知朝鮮叛亂事；八月十八「平壤失守」時，對事件的細節亦有了解，「辰初上至書房，發看昨日三電，戌刻一電則平壤告不能守，云敵在高山架炮俯擊，人馬糜爛也」（陳義傑，1997：2730）。

第二位是同在京師、剛入職翰林院的蔡元培。戰爭開始時，他還沒有實際官職，因此不能第一時間看到電報。但是，不僅京城的政治氣候可以感知，還可以依賴官場之外的消息源。事實上，在戰爭開始一段時間後，蔡元培主要是靠上海新聞紙獲得消息。1894年六月十三，他第一次讀到新聞紙，「閱上海《新聞報》記朝鮮事」（王世儒，2010：3），就詳細摘錄事件的來龍去脈；九月十三以後，上海字林洋行出版、擁有不少電報新聞的《滬報》，成為蔡元培首選的閱讀材料，由此他也跟上了戰爭的進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所謂引起全國性震動，事件的影響力自然要溢出政治中心。在京師之外，還有很多人同時在關注著戰爭，皮錫瑞就是其中之一。這位來自湖南長沙、飽讀詩書的舉人，因科舉挫折，長期在江西南昌坐館教書。在戰爭之前，他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世界主要由古典詩文構成。但戰爭開始後，無論在江西或回湖南，他都能及時地知曉局勢。一方面是周圍有許多讀書人，彼此交換信息，如1894年六月廿四，「鄒殿書至，談洋務，云英國或出排解，朝鮮想不至於大決裂」(吳仰湘，2015：298)；另一方面，上海《申報》持續提供了戰事的新聞，如七月十二，「見《申報》言海上戰事。陸戰多勝，海戰互有勝敗」(306)。皮錫瑞的消息之所以比較靈通，與其所在江西和湖南兩省位處長江流域有關，借助發達的水系，《申報》迅捷地擴散到上海以外的地區。

第四位是浙江溫州的舉人張綱。相較於皮錫瑞，張綱的流動性、社會資源和人際交往要羸弱不少。溫州雖地處浙江，但地理多山而交通不便，人員往來和信息流動較為遲滯。不過畢竟離上海較近，能夠看得到《申報》。譬如，1895年二月二十三，張綱即記：「閱《申報》，旅順及山東威海衛均被奪，中國兵輪均被轟沉，二員大員逃者逃，殺者殺，而人民遭其屠戮者更不可勝計。」(俞雄，2003：24)四月初六，「接到郡城內弟周仲民函，並《申報》一束」(24)。由此可見，他所閱讀的新聞紙，是通過城裡的友人代買並寄送的，不如皮錫瑞在江西和湖南讀得便捷。

第五位是來自山西的秀才劉大鵬。葛小佳、羅志田(2011：45)曾以他為原型，闡述近代中國存在兩個世界，「一個以京師和通商口岸及其影響輻射區為一方，以廣大的內地為另一方」，兩者的社會變化「或者不同時，或者不同義」(55)。由於山西缺乏水系，交通不便，所以這段時期劉大鵬的日記中沒有出現新聞紙。不過，這也不意味他就處於梁啟超所說的隔絕狀態，因為在現代傳播媒介之外，傳統中國還存在著一個歷史悠久、建立於市場基礎上的口頭網絡，即如孔飛力(Philip Kuhn)(1999：42)所描寫的，「那種在今天的中國作為對於政府控制的新聞媒體的補充而顯得特別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經有了發展，關於別的地方存在著什麼機會、或有什麼危險的消息，是當時中國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是須臾難離的」。這個口頭網絡的消息是劉大

鵬感知遠方事務的主要來源。如1984年十月十四，「有人從省來言，軍務吃緊」（喬志強，1990：35）；十二月二十三，「昨日在省，聞軍務吃緊，倭寇入遼東界，官軍屢打敗戰，勁軍甚少，不知確否」（37）。當然，相較前面四位，劉大鵬對戰爭進程的了解比較模糊，只是大概知曉事件的發展趨勢。

以上五位不同地域和身份的讀書人的經歷表明，彼時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層級的信息傳播網絡。在上層政治中，消息的擴散主要由電報這個新技術組織起來。在經歷了初期對電報技術的猶豫之後，清政府自1880年代起改變態度，迅速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電報網絡，「歷史上第一次用電信的方式把遼闊的帝國聯繫起來」（周永明，2013：52）。在1894年時，全國已經有約20個省份通聯電報，所以翁同龢可以及時地獲得各路消息。

不過像翁同龢這樣的人畢竟少數。大部分官場之外的讀書人，更多是從新聞紙獲取消息。甲午乙未之際，新聞紙的分布已逐漸「由點成線」，「上海、香港、廣州、漢口、天津五大城市結合起來，在中國的華東、華南、華中、華北建立起五大報業基地，以此為基幹，再將散布各地的報業線點聯成一氣」（甯樹藩，2003：115）。尤其是上海的幾份中文報紙已經具備向全國及時傳播新聞的能力。以《申報》為例，一方面是擴大發行範圍，「（光緒）六年，重要各都市，無不有本報，如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漢口、南昌、九江、香港、安慶、保定、廣東、廣西、四川、湖南、杭州、福州、蘇州、揚州、寧波、煙台等處，外埠信局皆代售本報。二十三年，設本報批發處於各要鎮。長江各埠趕早發出，能當日見報」（李嵩生，1923：69）。另一方面是常常借助電報刊登新聞，大大縮短了事件和閱讀的時差。新聞紙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進步，使其迅速擴散，成為社會中數量龐大的讀書人獲取時事的首選。譬如，沒有實際官職的蔡元培、在長江流域流動的皮錫瑞、住在溫州鄉下的張櫛，他們組成的集體正是晚清讀書人的主體，是社會輿論的主要來源。

對劉大鵬來說，在戰爭發生時，他的閱讀世界還沒有出現新式印刷媒體，了解外部消息依靠的是不太穩定和不甚準確的口頭網絡。但必須指出，1894年的口頭網絡與1840年鴉片戰爭時相比，已有質的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同，因為社會中已經存在一個不斷完善中的報紙網絡，源源不斷地為口頭網絡注入新的材料。譬如，在1895年議和期間，劉大鵬就觀察到：「倭寇擾亂一事，人皆在意。近聞講和，即農夫野人莫不曰此萬不可者也。余自旋鄉，滿耳都是此言。」(劉大鵬，1990：43)可見普通百姓的反應與讀書人群體是同步的。

由此，電報、新聞紙和口頭網絡，構成了當時社會傳播的物質基礎，這三個網絡在橫向結構上，分別連接了上層官員、普通讀書人和社會大眾等不同身份的人群。人們所倚仗的網絡資源不同，造成信息獲取的時間和豐富程度的差異。在縱向結構上，這三個網絡並非彼此隔絕，而是存在由上至下的滲透關係：電報被新聞紙予以積極利用，讀新聞紙的人不斷與他人交談，又為口頭網絡源源不斷地提供消息。這種縱橫的聯繫，促成了甲午乙未時期社會的一體化，其中，新聞紙扮演了核心角色，是形成全國性震動的主要原因。

表一 五位讀書人對戰爭新聞的獲取

人物	身份	地域	主要媒介	事件進程和閱讀時間		
				開戰	平壤敗	議和
翁同龢	核心官員	北京	電報、奏折	六月十三起 持續關注	八月十八起 持續關注	三月起 持續關注
蔡元培	普通官員	北京	報紙、人際	六月十三	八月二十九	四月初六
皮錫瑞	讀書人	江西 湖南	報紙、人際	六月廿四起 持續關注	九月初四起 持續關注	三月廿三起 持續關注
張櫛	讀書人	浙江	報紙、人際	未見	未見	四月初六
劉大鵬	讀書人	山西	口頭	未見	十月十四 模糊知曉	四月十五

具體地說，全國性的震動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衡量。儘管有些日記只是部分地被整理呈（如張櫛、劉大鵬），但從表一可知，分散各地的讀書人依靠社會傳播的三種媒介，仍逐步實現了對事件的同時性關注，尤以平壤戰敗與議和時為顯著。由於電報的出現，信息傳輸的速度大為增加。早在1884年中法戰爭時，電報就使「以往費時需要四十多天傳送的消息縮短為兩三日可達之事」（周永明，2013：74）；到了1894年，朝鮮的戰爭信息當日可達北京。這自然惠及了新聞紙的報道以及讀者的閱讀，「電報對諸如《申報》那樣的中文報紙的影響深遠……縮短了

從事件發生到新聞報道觸及公眾所需的時間，並能及時提供有關事件進展和公眾反應的追蹤報道，從而提升了新聞對大眾的影響力」(75)。由此，不同地域的人以一種接近同步性的閱讀、談論和情動就成為可能。新聞紙作為「新媒體」的力量就蘊藏在此，無論是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2005) 的「想像的共同體」，或是塔爾德 (Gabriel Tarde) (2005 : 237) 所說的「激勵民族活力並使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正是報紙每天波動的情況」，都建立於這種時間上的同時性。

談論國家：時空、文化－政治與自我/他者

雖然閱讀是偏向個人化的活動，分散於獨立的時空，但讀報卻具有激發公共交談的能力。塔爾德 (2005 : 234) 說，報紙「改變了個人談話，既使之豐富多樣，又抹平其差異，使人們的談話在空間上整合、在時間上多樣化；即使不讀報但和讀者交談的人也會受到影響，也不得不追隨他們借用的思想，一支筆足以啟動上百萬的舌頭交談」。恰如其言，在戰爭與議和期間，讀書人的交往世界出現了普遍的變化：從談詩說文轉向議論時事。人們不再主要關心缺乏現實意義的古典文獻，而將注意力聚焦於眼前的國家事務；他們不斷交換聽來或讀來的最新消息或評論，對國家的感知以碎片化的形式日積月累。

交談是無所不在的日常實踐。儘管其重要性常被強調，但由於談話的內容飄忽不定，理念也甚難操作，因而很少真正進入研究的視野。Skey (2011, p. 11) 嘗試將「話語」理解為「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談論、理解和實踐世界的方式」，並將其運用於人們談論國家的語境之中。他指出，關於國家的話語實踐往往包括五個維度：空間、時間、文化、政治以及自我/他者。本文將借用並綜合這五個維度，以皮錫瑞持續而詳盡的日記為材料 (吳仰湘, 2015；下文引用該文獻只標明頁碼)，分析他及友人在戰爭與議和時期談論國家的方式，以及這些話語實踐之於讀書人與國家關係的意義。之所以圍繞皮錫瑞展開敘事，首先是因為他在此期的日記非常完備，相關閱讀、交往和感受均有記錄，不僅可以知曉讀了什麼，還能進一步探究交談內容和心靈世界；其次與他的社會身份和生活經歷有關，在本文所列的五位讀書人中，皮錫瑞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於「中間狀態」，既不在官僚體制之中，也不同于閉塞之地的劉大鵬，他的經驗可能彙集了晚清讀書人更多的共性。

空間—時間

Winichakul (1996, p. 67) 指出：「毋庸爭議的是，領土是一個國家在整體管理中最實體性的特徵。對於理論地理學家來說，它意味著國家的領土。對於國民來說，這是其『自身』的組成部分，一個集體化的自己。」在19世紀末，讀書人雖還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但在實際的戰爭進程中，他們不可能不關心現代國家意義上的領土，因為正如上面引文所示，人們常常將自我擴大直至等同於所在的政治體，領土變成讀書人自身的組成部分。透過皮錫瑞的日記，我們看到他們貫穿始終的對領土的深切關心。

1894年六、七月，尚是戰爭的初期，讀書人的注意力主要停留在朝鮮戰場。七月二十這一天，皮錫瑞多次與友人談及朝鮮事，「見李叔和，云劉毅齊死，中興將帥又弱一個。朝鮮奏捷，謬公亦言之，云近數日無聞也。下午至芟齡處，則傳聞又異，云牙山以無救失守，死者甚眾」(309-310)。情況可謂一波三折。此後，「言時事」幾乎每日出現。直到九月初四，終於通過《申報》知「平壤失守」(331)，擊破了對宗主國保護附屬國的最後一點想像。

隨後，他們的視線隨戰事轉向了更重要的國內。早在七月初一，談話的主題就涉及領土，「晚間至殿書處，談海上戰事。殿書云，只要數船封日本海口，不使出，為上策，否則，恐其侵我沿海各處」(301-302)。其中，「我沿海」三字，通過與他者的區隔，充分體現了自我和國家的統一關係。時序進入九月，戰爭形勢急轉直下，國內戰場危機四伏。十月十四這一日的交談記錄十分典型：

汪受明至，言京中消息甚不好，人心惶惶，廿七、八日又大敗，鳳凰城失守，旅順口登岸。披地圖共閱，牛莊距海洲不遠，旅順口為金州地，所謂金、復、海、蓋四州是也。過此則為遼陽。遼陽北為奉天，鳳凰城北無城，直至遼陽。如二處皆失守，則彼

聲援相接，遼、沈危矣！鳳皇城西南隅大凌河為錦州、松山，再南為寧遠，再南為山海關，南來則京師亦危，誠不料大局至此。
(344)

這段話涉及東部沿海的多個城市，其空間想像，是從沿海、京師再到「大局」的一個連續擴大的國家領土。在談論之餘，他們還拿起地圖參詳形勢。這個地圖不再是以往那種建立於道德秩序、將中國視為天下中心的地圖，而是類似「作戰和沿海航行所用的圖表式指南構成」的「世俗化地圖」（安德森，2005：167）。恰如段義孚（Yi-Fu Tuan）（1998：171）所說：「小比例尺地圖鼓勵人們想像他們自己的國家為自己自足的獨特單元體。可見的疆界有助於主權國家之國家感的建立。」讀書人關於國家領土和邊界危機的想像，就蘊含在這個行動之中。隨著戰事的節節敗退，皮錫瑞對領土的憂慮更為深切，類似「大局不可問」、「大局決裂如此」的話常常出現。

對心靈造成更大衝擊的是1895年春天開始流傳的「割地」。三月廿六，皮錫瑞與友人「談時事」，「云伊所聞除兵費三十千萬外，遼陽以南皆歸彼，澎湖、台灣亦在內，且有長江水師炮台聽彼干預之語。若然，則大事已去，天下不可復問，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天下，懷於陰人賊臣之手」（397）。此段中，「金甌無缺」是對曾經國家領土完整的描述；如今，土地失去，對「大局」的憂慮更擴展為對「天下」的憂思。

與空間緊密相連的是時間。對國家而言，「過去通過民族的術語（national terms）表達出來，現在蘊藏在日常和大眾的儀式中，從而能夠設想一個（相對）安全的未來。」（Skey, 2011, p.11）。在戰爭與議和期間，皮錫瑞等人面對不如意的現在，常常以過去來比擬，並指向一個比較消極的未來。具體而言，熟悉歷史的讀書人，在危機時刻習慣回溯過去。如1894年十月十二，「蓉墅言時事更詳……英德二國有包打日本、取回朝鮮，索費二千萬，無敢主議。議和議戰，爭鬩於廷。此宋、明大弊，今復然矣」（343）。國家的「未來」則指向悲觀，尤其是「割地賠款」的消息散播後，類似「天下不可復問」的字眼就常常出現。1895年四月初四，皮錫瑞與友人談話後，即有「時未立夏，如此南風大熱，塙是早象亡國之兆也」（400）的感慨；四月十五再談，又有「今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國安得如此多金？橫徵必亂，且如人盡去其脂膏，又安得久活？」(403)的反問，言語之間透露出來的是不確定的未來感。

文化－政治

「文化－政治」是關於國家主體運作的話語。前者強調「以象徵體系去定義和證明一系列為其成員共同遵守的社會規則」；後者強調「政治組織在動員和維持國家運轉方面的重要性」(Skey, 2011, p. 12)。從話語實踐的角度看，就是讀書人怎樣談論國家權力和文化儀式的運作。在甲午乙未這一年，皮錫瑞及其友人，由於對戰爭與議和的不滿，激發出大量對於國家政治和文化事務的批評。在帝制中國，由於政治和文化是兩種高度融合的事物，因此這裡將這兩個維度綜合起來分析。

皮錫瑞等人圍繞「文化－政治」的話語實踐，主要體現在對朝廷用人和戰事決策的批評。如1894年十月十二，「聞尹臣親家到城，往見。受明出頌年信，云京城人心驚慌，京官多送眷歸……合肥不去，無可挽回。敗兵、降將、漢奸，不辦一人，何以激勵？」(343)十月廿四，又有類似批評，「同叔瑜至久安先生處……《申報》言恭王督辦軍務，各省兵皆歸節制，何必以慶郡王、榮祿輩參之？翁、李二先生與剛毅入軍機，不見出者，何也？」(348)這些對具體人事的不滿，積累起來就會上升到對國家的批判。如十一月十九，「程子大見訪，談時事，云讀書無用，今講西學，著有各種表文，暇時當往觀。伊云中國惟人眾居最，出產貨物在十二等，足見中國之貧。然中國本不以貿易為重，其所以貧者，由理財、治兵無術也」(355)。

此外，還有不少對戰爭以外事務的批評。恰如Fox & Miller-Idriss (2008, p. 540)所言，在日常生活中有兩種關於國家的話語：一是「談論國家」(talking about the nation)，另一是「帶著國家談論」(talking with the nation)。在前者中，國家及其事務是人們談論的對象；在後者中，國家成為闡釋其他事件的框架。對皮錫瑞而言，是否對這場戰爭有利就成為看待事件的框架。譬如，1894年十月十二，「京師祝壽至頤和園，鋪張如舊，無敢說者。倘有變故，可為寒心」(343)，批評的是朝廷在戰爭期間仍大肆慶祝。十一月廿一，《申報》刊載太後懲罰妃子的

新聞，皮錫瑞亦十分不滿，「此事甚不妙。現已兵臨城下，兩宮有隙，亦當容忍，如此舉動，愈為敵人窺破矣。以詩書禮樂之邦而內亂，何以能國？」(356)可見，許多非政治性的日常事務，也被讀書人置入是否有利於國家的新框架中予以衡量。

自我/他者

區分自我和他者，是現代國家認同的重要機制。大貫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 (2016: 292)指出：「自我/他者的相遇可能是通過貿易或人與物的流動而發生的，這種相遇有可能是緊張和敵對的，如在戰爭、征服和殖民主義情形下，多數情況會導致在受害方中產生政治民族主義」。對近代中國而言，政治民族主義的誘發主要來自帝國主義的外在壓力，尤其是1895年以後的日本，它是沈松僑(2002)所界定的「重要的他者」，「指地理與位置上與國族毗鄰，互動頻繁，卻對國族持敵對態勢，從而嚴重威脅(或被認為是威脅)到國族之生存的其他國族或族群團體」。雖然讀書人一時不願意承認日本的強大，但越是這樣，戰敗與議和的結果就越讓人震驚，以至於他們不得不在中日框架下重新看待世界。

「中國/日本」這個框架隨戰爭進程而逐漸顯露。無論是閱讀或是在談話中，日本這個他者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成為與中國並置的對象。譬如，皮錫瑞1895年二月廿一的日記：

閱《申報》，云十八子已覲天顏，詢謀簽同，皆主和議，倭首已允和，惟須先見國書，割地以畀，以愚見懦人，倭寇實無大志，其取旅順、威海，意在踞險要以脅和，不犯京師與盛京，恐禍大無以為和議地耳。我中國似未知情，故為所脅。然出關之兵二十萬，未聞一戰，大抵躲在空處，亟望和議之成。將士如此，欲不為所脅，亦何可得耶？(385)

雖然仍在使用「倭寇」這個帶有歧視性的稱謂，言語中仍有不屑之意，但這種近乎每日的提及實質上確認了這個他者的重要性；「我中國」的說法，不但突顯了他者，也顯示出一種彼此區隔的意識。隨著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爭進程的深入，作為他者的日本步步逼近，作為自我的中國卻節節敗退，兩相對照，是引起讀書人焦慮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1895年的中國，讀書人已經開始意識到，不僅要面對日本這個新的重要的他者，國家周圍還散布著不少西方列國，試圖介入戰爭以獲取不同層面的利益，這客觀上加快了他們從「天下」觀念中走出來的步伐。皮錫瑞和友人的談話中，時常有西方國家的身影。以1895年四月廿四的交談為例：

往廉訪處，云和約未見上諭，昨有電報云倭已將奉天各處退還，倭以台灣讓英，而德法不允，又聞俄日已開仗，各國均謂兵費太重，或可核減……攜芟舡兄弟至李宅請仙，詢時事，云：「豆分瓜剖動人疑，事亦尋常並不奇。奇絕華夷同萬國，本來面目失多時。」(406)

上面這段話，涉及德國、法國、俄國與日本，讀書人心目中的那個天下已然變化；而最後這首文采不佳的詩，使用了「豆分瓜剖」、「華夷」和「萬國」等新舊交織的話語，顯示了過渡時期普通讀書人對國家與世界的認知狀態。儘管還殘留著許多舊式語言，但是天下觀曾經所規範的秩序已經受到巨大衝擊，取而代之是一種與西方國家同處世界、擔心被別國瓜分的憂慮，這正是晚清的普通讀書人重新想像國家的基本框架。

情動國家：悲痛、憤怒與羞恥

在一個民族國家之中，其成員往往「代表了一種共同的情感」(米勒，波格丹諾，1992：493)。戰爭與議和期間，除了持續閱讀和討論時事之外，人們還接連生成了對國家的多樣化情感。總體而言，在這一年裡，讀書人的心情是普遍壓抑的。討論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他們在甲午乙未年間遭受的痛苦、憤怒和恥辱，是繞不過去的議題。

情感並不僅僅屬於個人心理的範疇，而是具有社會性的事物。面對複雜多變的情感，社會學的早期研究指出了四種基本的情感類型：恐懼、憤怒、悲痛和高興(特納、斯戴茲，2007：3)。隨著研究的深

入，Thomas Scheff (2015) 進一步界定出人類基本的情感類型，包括「悲痛、害怕、憤怒、自豪、羞恥」等。本節將借用 Scheff 的界定，以皮錫瑞日記為主要史料，發掘當時的讀書人在這一年中生成的主要情感類型，這裡面的每一種情感類型都指向著共同的對象，從而將遠近不同的讀書人聯繫起來。

悲痛

人有悲歡離合，「悲痛」(grief) 可能是人類最常面對的情感類型。在日常經驗中，這個詞視情境不同而有許多替代性的表達，如痛苦、悲傷和難過等。Scheff (2015) 言簡意賅地指出，悲痛是一種關於「失去的情感」(the emotion of loss)。對戰爭時期的讀書人來說，悲痛的並不是個人層面的事物，而是將自身外化為國家時所產生的情感。隨著戰場一個一個的失守，悲痛也一次又一次被激發。它不是一種暴發式的情感，而是持續發生並逐漸累積。

儘管明治維新已實施多年，但還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這個不起眼的鄰居。起初，讀書人對戰爭形勢並沒有整體的判斷，心情也是好壞參半。如下面的這兩個片段即可說明：「六月廿八，東洋已開仗，互有勝負，中國兵餉船為水雷所轟，損二千餘人，可傷也」(299-300)；過了幾天，就有變化，「七月初二，云開仗打死日本一大帥，稍可快心」(302)。

從皮錫瑞的日記看，戰爭早期寫下的文字總體上比較冷靜；在戰事之外，還記錄很多談論詩文的活動。不過，隨著一些重要戰役的失守，跟痛苦相關的表達就顯著增加了。轉折出現在九月初四的「平壤失守」，自此皮錫瑞和友人的情緒就激動起來，他們沒有想到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竟然不堪一擊。到了十月，戰場轉移到中國境內，有關「痛」的表述越來越多，如「十月十六，聞有山海關失守之耗，尤可駭！」(345)；「十月十七，晤彝仲及劉振愚，論時事，扼腕久之」(346)；「十月廿四，作《兵車行》，痛言時事」(348)。

由此，「痛言時事」幾乎是每日的情緒。痛苦需要分享，這種悲痛感促使讀書人不斷表達。到第二年春天，戰爭大局已定時，有關悲痛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的話語顯得更為深沉，如「二月初三，閱《申報》……觀報所列《戰和末策》，於山東大員退守關外，督師逗留之弊痛切言之，尤堪痛哭矣」(379)；「二月初五，《論喪師失地之由》一篇，可為痛哭」(380)；「二月廿六，……傷哉！傷哉！」(387)。從「可傷」到「痛言」再到「痛哭」，正印證了Scheff(2015)所言，悲痛的情感最後常常連帶著「失去和哭泣」。

由皮錫瑞這段情感外露的日記可知，在戰爭與議和期間，讀書人的悲痛感逐漸加深，其根源是一種逐漸積累的挫敗感。這種感覺原本不是個人的，而是國家的，但是當讀書人將自我投射到國家身上時，「失敗－痛苦」就成為一種集體的情感。Jing(2005)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國的文學創作就抓住了人們對自我和國家的不滿，生產出一種可以稱作是「失敗的文化」，用於塑造近代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和國家認同。

憤怒

較之痛苦，憤怒(anger)被認為是有「破壞性」的情感(Scheff, 2015)。它是一種外化的、有對象感、更需要表達的情緒。在戰爭期間，讀書人不由自主地反思造成他們「失敗－痛苦」的根源來自哪裡？誰應該對失敗負責？一旦找到了共同的目標，痛苦就會轉化為強烈的憤怒。

1895年的中國，還很少有人對皇權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普通讀書人更傾向於把失敗歸結為具體的人事。因此，那些參與戰爭與議和的人，就成為憤怒的對象。其中，李鴻章是被評述最多的人之一。如「九月廿一，平壤之潰，由北洋不發子藥，將軍餉二百萬送與日本。老奸鬻國，寸磔不足蔽辜」(336)；「十月廿四，李黨如此可惡，不知何心？」(348)；「十二月初五，聞朝鮮本不願與夷人通商，合肥迫之。食此人之肉，不足蔽其辜也」(360-361)。除此外，官僚系統也是釋放憤怒的對象。如十月十五，「君華至，言奉天已失守，……昭陵在彼，視同鷗脫，近日泄沓之輩不足責」(345)；二月初八，就有類似的文字：「草茅之士，聞之涕零，而受恩深重者，猶笙歌宴飲，洋洋如平時，所謂全無心肝者歟？」(381)

「當憤怒以口頭表達，而不是表現為大喊大叫或侵略時，它可以是建設性的。它向自我和他人解釋了一個人是如何感到沮喪的，以及為什麼」(Scheff, 2015)。讀書人在交談中對人事和官僚系統的失望，使彼此理解了這種情感的來源。此外，這種「失望－憤怒」，由於是出於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因此還帶有了正義性。Tangney、Stuewig 及 Mashek (2007, p. 28) 的研究表明：「正義的憤怒是為了回應一類特殊的事件，即犯罪者行為違反了普遍的道德規範……作為一種道德情感，正義的憤怒會刺激旁觀者對不公正的事情採取行動。」對沒有實際官職的讀書人而言，他們的行動除了集體「上書」之外，就是在日常交談中持續地表達意見，以形成社會輿論。由於他們有著相似的使命感，以及同一個的批評對象，這種情感實踐使得他們尋求到一種共同感。

羞恥

羞恥 (shame) 是一種「受到強烈侮辱的危機感」(a crisis feeling of intense disgrace) (Scheff, 2015)。對中國讀書人而言，羞恥感集中爆發於議和達成之時。《馬關條約》令人瞠目的割地賠款，讓人無法接受，因此造成了一種普遍的屈辱感，以及連帶的憤怒。伯林 (2009：247) 指出：「導致民族主義發生的通常是創傷感，是某種形式的集體恥辱……成為驕傲的鄰居們輕視或屈辱俯就的對象，這無論對個體還是社會而言都是一種最具傷害的體驗。」這句話尤為適用 1895 年的中國，議和帶來的情感傷害是十分真切的。

眾所周知，議和是全國性的情緒共振的最高點，不僅在北京考科舉的舉人們行動起來，許多京城之外的讀書人也十分激動，羞恥以及已經積累多時的悲痛和憤怒交織在一起，集中爆發出來。在聽聞議和條款後，皮錫瑞寫到：

閱初八、九《申報》云和議難成，初十云昨已用禦實。言者似以割地為恥，有加百兆不割地之說。予謂割地如去人一手或一足，人雖殘廢，暫可不死，和銀二三百兆，如將人之精血吸盡，比死無疑。今年一萬萬何從出？含糊應允，而臨時無此項巨款，又起兵端，且更為外國恥笑矣。(40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無論其具體觀點如何，這裡面都表達了為外國人恥笑的心緒。在當時，這種心態十分普遍。比如，蔡元培的表述，「合約十事，其大者，割台灣……韓魏於秦，宋於金，不如是之甚矣」(蔡元培，2010：31)，其羞恥感的來源是當下國家的現實連歷史上的韓、魏和宋朝都不如。而張綱的表述更為直白，其羞恥明顯地與國家聯繫在一起：

據三月間《申報》云：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出使日本議和……近已得議和卻因，謂朝鮮及旅順、威海衛等所失之地，均永歸日人管轄，南省澎湖、台灣亦歸日人管轄，並賠日人兵費三百兆兩，分作七年交清！噫！國本空虛極矣，為大臣者不能背城借一戰為國雪恥，而始終以一和字為上策，如此割地求戰，遂小國尚且恥之，況堂堂中華乎！（張綱，2003：24）

還可以舉出很多例證，來說明當時讀書人心中的普遍羞恥感。仔細分辨，這種情感又分為兩種，一是「為他人而羞恥」(王佳鵬，2019)。在不少言辭中，讀書人都表達了對李鴻章等官員的不滿，如1895年二月廿四，皮錫瑞嘲諷李鴻章父子一起去日本議和，「合肥往倭乞和，李經芳參贊。父子同使，古來未有」(386)，隱含著其不知羞恥而為其恥的意思；而張綱的話，「為大臣者不能背城借一戰為國雪恥」，也是充滿為官員羞恥的心情。Lickel、Schmader及Spanovic (2007, p. 355) 指出，為他人羞恥「涉及到一種想像的自我暴露感」，「由於個人從他們在社會群體中的成員身份中獲得了認同感，當他們目睹與他人分享他們的群體身份的人從事被視為有缺陷的社會身份行為時，他們可能會感到羞愧」。所以，當官員代表國家去日本乞和時，讀書人認為他們有辱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不過，更深層的恥辱是「為自我而羞恥」。這種羞恥感的實質在於將個體的自我投射到集體的國家。中國讀書人向來抱有「入世」、而不是與國家疏離的精神，因此，國家的恥辱就是自我的恥辱。而且，羞恥本身就是一種具有傳染性的情感，如Scheff (1990, p. 18) 所言：「羞恥感具有顯著加強和延伸的潛力，因為它可以在交往的人們之間傳遞。我將這種社會和心理的循環看作多重的螺旋：在每一個相互作用者內部和作用的人之間。具有傳染性的羞恥之多重的螺旋，會讓這種

狀態持續加強。」因此，羞恥也隨著人際的互動交流而不斷蔓延，成為每一個關心國家的人的共有的情感。

由上可知，悲痛、憤怒和羞恥彼此交織，構成了1894到1895年之間讀書人的情感世界。「情感是一種動機力量，因為它不僅使人們的主觀體驗有序，而且賦予人們以力量，指導行動的方向」（特納、斯戴茲，2007：8）。由於對這些情感有著共同的理解，讀書人常常彼此交流，因此它們就不再局限於私人領域和內心世界，而成為Berezin (2002, pp. 44–45) 所說的「共同體的情感」(community of feelings)：「一個情緒的舞台，公民扮演和經歷集體民族情感的有界限的空間」。在這個舞台中，讀書人的種種情感實踐生成了關於國家的共同感。就個體的情緒看，儘管「恐懼、憤怒和悲傷等都是負面的情感，常常造成人與人的疏離」，但是作為一種公共的情感，它們「是把人們聯在一起的『黏合劑』，可生成對廣義的社會和文化結構的承諾」（特納、斯戴茲，2007：1）。在「中國的一年」裡，這些情感使讀書人「休戚與共」。

結語：同一個中國

由上文可知，甲午乙未這一年間，分散各地的讀書人因社會傳播的新情形，第一次對國家產生了同步、持續且具體的感覺。他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尤以蔡元培、皮錫瑞和張櫛為顯著。此一變化的過程可以概括為，「讀書人曾將『前人世界』的學問視作唯一的信仰。到1894年，新聞紙才將人們的思慮普遍轉入『共同世界』」，從而「形塑了一種『追求現在、關心國家』的現實主義精神」（卞冬磊，2015）。

在這幾位當中，又以皮錫瑞的記錄最為詳盡，這使他日常的閱讀、交談和情感具有分析上的集中度和完整性。其他幾位讀書人留下的痕迹，或有些零散，但有限的材料也能顯示，他們對國家的憂思有着諸多的相通之處。譬如，張櫛也不時與友人「談時事」，1895年五月十三即記有：「余因應君、陳君新自京師回，與縱談時事。聞今日和約雖成，台灣民心不服……」（俞雄，2003：25–26）。翁同龢作為戰爭的核心決策者，其日記多實錄電報和奏折，偶爾才流露情感，但平壤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敗後，他不止一次「感懷時事，悲從中來」(陳義傑，1997：2745)；旅順失守時「憤慮填膺」(2754)；割讓台灣時則「真可愧死」(2792)，可見也不能免於悲傷、憤怒或羞愧。

如果要在他們之中尋找差異的話，那麼，能否不間斷地接觸到新聞紙是影響其行為的一個關鍵性變量。五人中，翁同龢主要依靠電報和奏摺，處於信息接收的「上遊」，受民間刊行的新聞紙影響不大。但是對蔡元培、皮錫瑞和張桐這樣處在官僚體制的非核心地帶或之外的人來說，新聞紙不僅是主要的消息來源，也是激發討論和刺激情感的媒介。這幾人可以看作是京師和沿海地區讀書人的代表，他們或住在政治中心，或活動於沿海與通商口岸，或依水而居，均是上海新聞紙容易到達的地方。而處於內陸鄉村的劉大鵬，消息來源主要依靠口頭，對國家的認知就談不上清晰，確切的討論更難展開。事實上，他的變化要稍晚一些。1902年以後，當《晉報》在山西出版時，劉大鵬的閱讀世界才出現新聞紙，其國家認知相應發生實質變化：「與過往的『道聽途說』相比，報刊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建立於具體事務基礎上的『國家』圖像」(卞冬磊，2013)。劉大鵬的個案說明了近代「中國」的認知和實踐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發展的不平衡，儘管他也籠罩在本文開頭所描述的那個傳播網絡之中。

孔飛力(2003：56)說：「民族國家是一個更具有可變性的概念，它不僅以一種不確定的方式伸展到普通中國人中去，到了19世紀後期，更在中國面臨亡國滅種恐懼的影響下被激發出來。」誠如其言，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是在面臨的外部壓力中被動呈現的。在1894到1895年間，讀書人主要是在日本的陰影下，產生了對於國家的普遍感覺。稍微再延伸下歷史的視界，即可知曉日本作為帝國主義，深入參與塑造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恰如柯博文(Parks Coble)(2004：2)指出：「一個又一個事件的無情壓力不停煽動著中國民族主義的火焰，它形成了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

我們業已知曉很多關於近代中國亡國滅種的危機敘事，並理解1895年作為起點的意義。然而，對孔飛力所說的民族國家如何以穩定的而不是「不確定的方式」，伸展到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還探索地太少。

以往研究總體偏向從思想史路徑，尋找民族主義的蛛絲馬迹，譬如Cohen (1967) 在王韜身上發現了「初期的中國民族主義」(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不得不說，這種民族主義只有個體的意義，仍然是一種不確定的方式。本文與思想史路徑不同，通過探究讀書人的閱讀、交談和情動，探討民族國家是如何生成於日常生活的，這實踐了Brubaker (1996, p. 7) 關於國家的認識論：「國家是一種實踐的範疇、體制化形式和各類事件的構成。它是一系列實踐而不是敘述。要理解民族主義，必須理解對國家的使用，一種塑造感知、刺激思想和經歷、組織話語和政治行動的方式。」

民族國家要變成日常生活的確定形式，必須具備某種物質性的條件。從傳播的視角看，在1894到1895年之間發生的種種關於國家的交談、思考和情動，是建立於「讀報」這個實踐之上的。在19世紀前期，中國社會其實發生過許多理應令人震驚的事件，但卻從來沒有在民眾之中形成類似甲午乙未年的那種集體的共振。譬如，常常被作為近代史開端的「鴉片戰爭」，真正產生的社會影響很小，戰爭時期與蔡元培境遇相似的曾國藩，就從未關注過它的進程；而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時，即使是「火燒圓明園」這樣的屈辱事件，也未能引起多少警醒，這證明了本文所涉及之社會傳播的重要性。

具體而言，在1895年的中國，已經形成「電報－新聞紙－口頭」這個三位一體的傳播網絡。如前所述，在此網絡中，發行已較為廣泛的上海新聞紙扮演著核心角色，它們通過派出記者、採用電報新聞、翻譯外報等方式，持續地報道戰爭與議和的進程。在這一年間，清政府還從未意識到新聞紙這種「現代文化形式」的力量，因而關於戰爭失敗的新聞和議論從未受到干涉。就閱讀而言，其實早在中法戰爭之後，《申報》就已在不少洋務官員和讀書人之中流行；到甲午時，其影響隨發行網絡擴大而進一步增強，組織起蔡元培、皮錫瑞、張桐這類廣泛散布於京師、沿海和沿江地區的讀書人，新聞所到之處就是民族國家意義的生成之地。不僅如此，讀報還促進了民族國家在日常的「再生產」，激起了讀書人的交談和情動。國家就這樣被分散於不同地理空間的讀書人，同時且持續性地生產出來。正是在個意義上，1894到1895年的中國讀書人，藉由新聞紙的連接而擁有了政治意義上的「同一個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國」。這個處於變化之中、有著現時特性的共同體，顯著地區別於他們很早就認同的那個以道德、文化和科舉維系的文化中國。

1936年5月18日，上海左翼文人在《申報》徵文，邀請社會大眾以5月21日的素材記錄生活，來稿甚多，後由著名作家茅盾編成《中國的一日》。然而，在沈松僑(2009)看來，《中國的一日》雖然充滿「國族敘事的印痕」，但其意義卻不過是「一日的中國」，因為現實生活可能將很快進入「無可避免的柴米油鹽、喜怒哀樂，乃至偶然邂逅的路旁小花、天際雲彩」。與1936年的社會情境不同，本文描述的1894到1895之「中國的一年」，只是一個時代的開始。隨著傳播媒介的進一步擴散，以及讀書人群體堅韌的入世精神，日常生活中對國家的種種實踐持續不怠。儘管近代中國的歷史充滿著失去和悲情，但是「伴隨着對失去之物的放棄，存在著將情感投身到新事物中的重新定位，按弗洛伊德的話，新事物可以是抽象的，就像是新的國家、新的政體或者新的政治關係」(Montville, 1995, p. 161)。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大貫惠美子(2016)。《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石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Emiko Ohnuki-Tierney. [2002]. *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 The militarization of aesthetics in Japanese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guan Huimeizi (2016). *Shenfeng tegongdui, yinghua yu minzu zhuyi: Riben lishi shang meixue de junguo zhuyihua* (Shi Feng,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Emiko Ohnuki-Tierney. [2002]. *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 The militarization of aesthetics in Japanese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卞冬磊(2013)。〈報紙閱讀與晚清讀書人「國家」意識的形成〉，《二十一世紀》，第138期，頁25-34。
- Bian Donglei (2013). Baozhi yuedu yu wanqing dushuren “guojia” yishi de xingcheng. *Ershiyi shiji*, 138, 25-34.
- 卞冬磊(2015)。〈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上海新聞紙和中國現代性的發生〉，《二十一世紀》，第143期，頁68-81。

- Bian Donglei (2015). Gudian xinling de xianshi zhuanxiang: Shanghai xinwenzhi he zhongguo xiandaixing de fasheng. *Ershiyi shiji*, 143, 68–81.
- 方維規 (2002)。〈論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與「中國」〉，《二十一世紀》，第70期，頁33–43。
- Fang Weigui (2002). Lun jindai sixiangshi shang de “minzu”, “nation” yu “zhongguo”, *Ershiyi shiji*, 70, 33–43.
- 孔飛力 (1999)。《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原書Kuhn, P.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ong Feili (1999). *Jiaohun: 1768 nian zhongguo yaoshu da konghuang* (Chen Jian, Liu Cha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Kuhn, P. [199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孔飛力 (2013)。《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陳兼、陳之宏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Kuhn, P. [2002].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ng Feili (2013). *Zhongguo xiandai guojia de qi yuan* (Chen Jian, Chen Zhihong, Trans.). Beijing: Shenghuo · dushu · xinzh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Kuhn, P. [2002].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王世儒 (編) (2010)。《蔡元培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Wang Shiru (Ed.) (2010). *Cai yuanpei riji*.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王佳鵬 (2019)。〈從替代羞恥到集體義憤：公共輿論及其媒介建構的情感機制〉，《新聞界》，第2期，頁39–45。
- Wang Jiapeng (2019). Cong tidai xiuchi dao jiti yifen: Gonggong yulun jiqi meijie jiangou de qinggan jizhi. *Xinwenjie*, 2, 39–45.
- 史密斯 (2011)。《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與歷史》(葉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Smith, A. [2001].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e Press.)
- Shimisi (2011). *Minzu zhuyi: Lilun, yishi xingtai yu lishi* (Ye Jia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mith, A. [2001].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e Press.)
- 安德森 (2005)。《想像的共同体》(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原書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Andesen (2005). *Xiangxiang de gongtongti* (Wu Ruire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shiji chuban jituan. (Original book: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喬志強(編)(1990)。《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Qing Zhiqiang (Ed.) (1990). *Tuixiangzhai riji*. Taiyu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米勒，波格丹諾(1992)。《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原書Miller, D. & Bogdanor, V. [1987].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Basil Blackwell Ltd.)

Mi Le, Bogedannuo (1992). *Bulaikeweier zhengzhixue baike quanshu*. Beijing: Zhongguo zhengfa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iller, D. & Bogdanor, V.[1987].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Basil Blackwell Ltd.)

伯林(2009)。《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譯)。南京：譯林出版社。(原書Berlin, I.[1991].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London: Fontana Press.)

Bolin (2005). *Niuqu de renxing zhi cai* (Yue Xiukun,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erlin, I. [1991].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London: Fontana Press.)

李嵩生(1923)。〈本報之沿革〉。上海《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

Li Songsheng (1923). *Benbao zhi yange*. In Shanghai Shenbao guan (Ed.), *Zuijin zhi wushinian*.

呂思勉(1948)。《歷史研究法》。上海：永祥印書館。

Lu Simian (1948). *Lishi yanjiu fa*. Shanghai: Yongxiang yinshuguan.

沈松橋(2002)。〈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頁49-119。

Shen Songqiao (2002). *Jindai zhongguo minzu zhuyi de fazhan: Jianlun minzu zhuyi de liangge wenti. Zhengzhi yu shehui zhexue pinglun*, 3, 49-119.

沈松橋(2009)。〈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新史學》，第20卷第1期，頁1-59。

Shen Songqiao (2009). *Zhongguo de yiri, yiri de zhongguo —— 1930 niandai de richang shenghuo xushi he guozu xiangxiang. Xin shixue*, 20(1), 1-59.

金觀濤、劉青峰(2006)。〈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第94期，頁40-453。

Jin Guantao, Liu Qingfeng (2006). *Cong "tianxia", "wanguo" dao "shijie" — wanqing minzu zhuyi xingcheng de zhongjian huanjie. Ershiyi shiji*, 94, 40-453.

吳仰湘(編)(2015)。《皮錫瑞全集(9)》。北京：中華書局。

- Wu Yangxiang (Ed.) (2015). *Pi xirui quanji (9)*.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周永明 (2013)。《中國網絡政治的歷史考察》(尹松波, 石琳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Zhou Yongming [2006].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ou Yongming (2013). *Zhongguo wangluo zhengzhi de lishi kaocha* (Yin Songbo, Shi Lin,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Zhou Yongming [2006].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段義孚 (1998)。《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潘桂成譯)。台北: 國立編譯館。(Yi-Fu Tuan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uan Yifu (1998). *Jingyan toushi Zhong de kongjian he difang* (Pan Guicheng, Trans.). Taipei: Guoli bianyiguan. (Original book: Yi-Fu Tuan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柯博文 (2004)。《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中的日本因素 (1931–1937)》(馬俊亞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 Parks, C. [1991].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Ke Bowen (2004). *Zouxiang “zuihou guantou” —zhongguo minzu guojia jiangou Zhong de riben yinsu (1931–1937)* (Ma Junya,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Parks, C. [1991].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俞雄 (編) (2003)。《張欄日記》。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Yu Xiong (Ed.) (2013). *Zhanggang riji*. Shanghai: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 特納、斯戴茲 (2007)。《情感社會學》(孫俊才、文軍譯)。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Turner, H., & Stets, E. [2005].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na, Sidaizi (2007). *Qinggan shehuixue* (Sun Juncui, Wen Ju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urner, H., & Stets, E. [2005].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塔爾德 (2005)。《傳播與社會影響》(何道寬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Tarde, G. [1969]. *On communication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2期(2020)

- Taerde (2005). *Chuanbo yu shehui yingxiang*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Tarde, G. [1969]. *On communication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陳旭麓 (1992)。《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Chen Xulu (1992). *Jindai Zhongguo shehui de xinchen daixie*.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陳義傑 (整理) (1997)。《翁同龢日記》(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
- Chen Yijie (Ed.) (1997). *Weng tonghe riji (di wu c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張灝 (2006)。《幽暗意識和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
- Zhang Hao (2006). *Youan yishi he minzhu chuanton*. Beijing: Xinxing chubanshe.
- 梁啟超 (1954)。《戊戌政變記》。北京：中華書局。
- Liang Qichao (1954). *Wuxu zhengbian j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甯樹藩 (2003)。《甯樹藩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Ning Shufan (2003). *Ning shufan wenju*. Shantou: Shantou daxue chubanshe.
- 葛小佳、羅志田 (2011)。《東風與西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Ge Xiaojia, Luo Zhitian (2011). *Dongfeng yu xifeng*.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葛兆光 (201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
- Ge Zhaoguang (2011). *Zhaizi zhongguo: Chongjian youguan "zhongguo" de lishi luns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羅志田 (1998)。《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
- Luo Zhitian (1998). *Minzu zhuyi yu jindai zhongguo sixiang*. Taipei: Dongda tushu.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erezin, M. (2002). Secure states: Towards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emotion. In J. Barbalet (Ed.), *Emotions and sociology* (pp. 33–52). London: Basil.
- Billig, M.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rubaker, R.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P. (1967). 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26(4), 559–574.
- Duara, P. (1993)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0, 1–26.
- Fox, J., & Miller-Idriss, C. (2008). Everyday nationhood. *Ethnicities*, 8(4), 533–563.
- Fox, J., & Ginderachter, M. (2018). Introduction: Everyday nationalism's evidence proble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4(3), 546–552.

- Lickel, B., Schmader, L., & Spanovic, M. (2007). Group-conscious emo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others' wrongdoings for identity and relationships. In J. Tracy, R. Robins, & J. Tangney (Eds.),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51–370). 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 Knott, E. (2015). Everyday national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tudies on National Movements*, 3, 1–16. Retrieved from <http://snm.nise.eu/index.php/studies/article/view/0308s>.
- Montville, J. (1995). Mourning and mobilization for nationalism. In J. Braun (Eds.), *Social patholog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59–173).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 Scheff, T. (1994). *Microsociology: Discourse, 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eff, T. (2015). Toward defining basic emotions. *Qualitative Inquiry*, 21(2), 111–121.
- Skey, M. (2011). *National belonging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angney, J., Stuewig, J., & Mashed, D. (2007). What is moral about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In J. Tracy, R. Robins, & J. Tangney (Eds.), *The self-conscious emo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1–37). New York &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 Tsu, J. (2005).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China modern identity, 1895–193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nichakul, T. (1996). Map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geo-body of Siam. In S. Tennesson, & H. Antlow (Eds.), *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 (pp. 67–91). Richmond: Curzon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卞冬磊 (2020)。「中國」的一年：新聞、閱讀與民族－國家在日常的興起 (1894–1895)。《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2期，頁87–115。